

孙中山若干图片考析

余 齐 昭

孙中山一生中有许多单人照，而更多的是与家属、同志、朋友等的合照。因年代久远，或当时未有文字说明，或追记有误，或借印者误记，或有意篡改等原因，造成各种孙中山图片传记照片的说明出现时间有误、地点不确、人物弄错、事件不详等问题。为还历史本来面目，笔者对一批照片进行若干考析。

孙中山在日本与友人合影于 1901 年

附图 1，最早刊载在《大革命写真画》第 12 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4 年 4 月出版）第 4 页，其说明是：“运动革命时之孙大总统及其友沈翔云、唐麟等。”自左至右：尤列、唐才质、孙中山、秦力山、沈翔云。该图在《革命逸史》第 1 集和《逸经》第 2 期插图的说明，均认为 1906 年摄于东京。在《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39 图则说 1900 年在日本合影。

但是，1906 及 1900 年两说均与孙中山及其他人物在东京活动的时间不合。

1899 年 8 月，梁启超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自任校长，从学者有前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学生秦力山、林锡圭、唐才质等 10 余人。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界接触始于此时^{〔1〕}。亦在此时，秦力山才结识孙中山、沈翔云等人。1900 年 5 月义和团运动兴起，为使义和团改“扶清灭洋”为革命排满，秦力山只身赴天津与其首领痛陈利害，不果，乃至汉口参加自立军运动，8 月失败后，潜至南京。后至新加坡，再渡日本。1901 年 5 月与戢翼翬、沈翔云、雷奋、王宠惠等在东京创立《国民报》月刊。同年 8 月 10 日出至第 4 期，因款绌停刊后，秦力山至上海，助戢续办《大陆》报。1904 年至香港，1905 年春至新加坡访尤列、黄伯耀，居两月赴缅甸，1905 年 6 月得孙中山自巴黎来函，约在新加坡相见。其时秦已离缅甸赴云南干崖担任教务，未能相会，1906 年 10 月 11 日于干崖病逝，年仅 29 岁^{〔2〕}。

尤列（1865～1936 年），字令季，别字少执，广东顺德人。自 1895 年广州之役失败后，逃亡西贡，随后潜返香港或澳门，1900 年则来往于长江一带。因助孙中山策划华南独立而被清政府悬赏通缉，不得已避往日本，于 1900 年 10 月 31 日抵达神户。11 月 15 日移居横滨中国人鲍式照处，与孙中山一起联络学界，开导华侨，与陈才、杨少佳、鲍唐、翟美徒、陈和等人组织中和堂，自任会长；又开始与留日学生戢翼翬、沈翔云、秦力山、程家桢、张继、蔡锷等频繁往还。1901 年 1 月 1 日，尤列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召开的元旦庆祝会，参加者有励志会会员等 30 余人，孙中山时在横

滨，未出席元旦庆祝会^{〔3〕}。同年4月20日，尤列离开横滨赴新加坡^{〔4〕}，创立中和堂，以后再次到日本时已是民国后三年的事了。

孙中山从1900年底至1901年4月9日离开横滨赴檀香山这段时间，多次往返于东京与横滨之间。

唐才质(1880～1966年)，湖南浏阳人，字法尘，唐才常之三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1900年参加自立军运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据他1965年回忆：“辛丑年(1901年)5月10日，余与秦力山、沈翔云、戢翼翬等，创办《国民报》月刊于东京。”“《国民报》将出版之前日，中山先生特囑尤列自横滨送来五百元襄助此报发刊经费”^{〔5〕}。这说明《国民报》创刊前，孙中山、尤列与唐才质、秦力山、沈翔云等人来往密切。

1936年11月12日，尤列在南京逝世后，唐才质撰一联挽之：“忆三七少年时，与我公及孙总理沈翔云秦力山四子，摄影东瀛，人事沧桑，弟独未死，经廿五年变乱，为袁项城曹仲珊孙传芳诸辈，操戈同室，外患眉睫，吾将焉归。”^{〔6〕}如“三七少年”是指21岁的话，刚好是1901年。

从以上所列史料看，此照不可能摄于1906年，因为秦力山自《国民报》创刊于1901年5月，停刊于同年8月10日后回国，直至1906年10月病逝云南，再未到过日本，也未再会孙中山。

尤列从1900年底至1901年4月20日这段时间在日本活动外，民国成立以前的其余时间均在内地或东南亚活动，而1900年11月刚到横滨，才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触，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不太可能合影于1900年底，而孙中山又于1901年4月9日离日赴檀，因此可以认为，此图在1901年春摄于东京或横滨，似应无误。

孙中山同家人合影的时间与人物考

孙中山在檀香山与家人的合影(见附图2)，摄影时间众说纷纭，有1896、1901、1903、1904、1905年之说。

1896年之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馆藏照片原说明：“这张照片摄于公元1896年春。国父于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经日本抵檀香山。杨太夫人、卢夫人、与子女亦自国内避难来檀，与德彰家族合住一宅。”《建国月刊》第4卷第6期插图也说：“总理三十岁时之家庭。”

1901年之说。《纪念孙中山先生》40图说：“1901年，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这是与家属在檀香山合影。”

1903年之说。《中华民国史画》(台北，1978年初版)第60页：“此照摄于1903年。”

1904年之说。《革命逸史》：“甲辰(1904年)总理由日本重至檀香山茂宜岛与全家合影。”

1905年之说。《逸经》第17期插图：“1905年总理由日本至檀香山茂宜岛与全家合影。”

查孙中山曾先后六次到檀香山：1878年5月～1883年7月；1894年10月～1895年1月；1895年12月～1896年6月；1901年4月～1901年6月；1903年10月～1904年3月；1910年3月～1910年5月。

照片摄于何时,我们先来看看照片中人物大概年龄来确定时间。据《建国月刊》第4卷第6期谓:“中坐者为总理母亲杨太夫人,前立者为总理幼女金媛,左立者为孙科,右立者为总理女金婉,后立者自左至右:女侍月红、总理之嫂谭夫人、总理侄细威、总理之兄眉、总理、卢夫人、总理义女信霞、侍女新兰。”

1981年6月25日,孙中山的外孙女、孙婉之女戴成功(1922~1991年4月)参加宋庆龄葬礼后返澳门途经广州时前来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参观,对此照片为笔者提供了人物名单:“中坐者为孙母杨太夫人,其前立者为孙婉戴夫人,我的母亲,生于1896年11月12日,与我外公孙中山先生同月同日生,杨氏左为孙科、右为孙姪,后排自左至右:月红、谭夫人(孙眉妻),细威、孙眉、孙中山、卢夫人、孙顺霞、×××。”

《建国月刊》所列名单与戴成功所提供的名单基本一致。

在此要说明一下细威与孙顺霞的身份。孙中山有大哥孙眉(德彰)、二哥孙德佑,德佑七岁殇,孙眉在檀香山领养一个土人小孩,名威,家人叫他细威或阿威,作为德佑的养子继承人。他生于1886年,卒于1935年^[7]。孙顺霞是孙眉的养女^[8]。顺霞有的资料写为巽霞或信霞或仙霞。

孙科生于1891年10月20日,孙姪生于1894年3月31日,孙婉生于1896年11月12日。此照片不可能摄于1896年以前,因为孙婉生于1896年11月,而照片中的孙婉已是一个好几岁的孩童了。若摄于1903年10月至1904年3月孙中山至檀香山期间,那么孙科已是十二三岁、孙姪近十岁、孙婉七岁,与照片中的年龄显然不合。1905年孙中山未去檀香山。因此此照不可能摄于1896年以前及1903年以后。

笔者认为,此合照应摄于1901年4月至6月间孙中山赴檀香山期间。当年孙科不满10岁、孙姪7岁、孙婉4岁半,正符合照片中孙科兄妹的实际年龄。

此合影摄于1901年的另一佐证是照片中没有孙眉之子孙昌(1881~1917)。1900年至1901年,他离檀香山赴日本大同学校和美国加州就读而未在檀岛^[9],1904年孙中山到檀时才与孙昌合影留念^[10]。

孙中山参加1918年元旦庆祝大会

附图3在《纪念孙中山先生》208图的说明是:“1921年10月在广州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留影。”在《纪念廖仲恺何香凝》(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51图,沿此说。

《中山特刊》^[11]对该图的说明:“民六年,先生率舰南下护法,在河南士敏土厂就职,王儒堂时任非常国会议长,坐先生之左。”

以上两种说法,孰对孰误,抑或两者均误?

关于第一说,《民国日报》^[12]有详细报导:当时在总统府举行的国庆纪念,非常隆重,有各部总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参军长、大理院长、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统府顾问、总统府参议等众多官员参加。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13]。然而该图片中除廖仲恺以外,

其余伍、唐、陈、汤、徐等均不在场。这说明此图不可能是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庆典所摄。

《中山特刊》认为是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士敏土厂就任大元帅职典礼上拍摄。根据也不充分。据当时报载：“孙君身衣陆军上将礼服。”^{〔14〕}而该图中的孙中山则身穿西服。同时，孙中山在非常国会就职时，廖仲恺仍在上海。迟至9月18日才启程离沪赴粤^{〔15〕}。因此他不可能出现在9月10日所摄的孙中山就职典礼上。所以，此图也不是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典礼时的照片。

然而该照片摄于何时、何地，又因何事而合影呢？

近查叶夏声著《国父民初革命纪略》（1948年广州版）才知道该图是摄于1918年元旦。该书插图“民国七年元旦护法摄影”是本文附图的局部，只取中间三排共36人（全图200人左右）。现抄录其所列名单（自右至左），前排：周应时、黎尊、祁耿寰、廖仲恺、孙中山、叶夏声、黄大伟、朱培德、吴铁城；第二排：×××、毛仲芳、梅放洲、李朗如、黄惠龙、×××、吴雅觉、×××、马湘、张惠长、陈庆云、×××、梅尊、×××；第三排：叶毅民、赵超、徐维扬、陈群、×××、萧萱、×××、钱述、杨虎、×××、×××、李禄超。除孙中山以外的25名单中，当时廖仲恺任署理军政府财政总长（1917年9月26日任命），黄大伟任代理军政府参军长（1917年10月14日任命），叶夏声任代理军政府内政部次长（1917年9月25日任命），杨虎任军事委员（1917年12月5日任命），周应时、吴铁城、祁耿寰、黎尊、赵超均为大元帅府参军；马湘、陈群、李禄超、萧萱均为大元帅府秘书；毛仲芳为大元帅府参议，钱述为印铸局技正、梅放洲为大元帅府参军处庶务科一等科员^{〔16〕}。

图片背景是士敏土厂厂房前的空旷草地上。孙中山、廖仲恺、叶夏声所坐藤椅同1918年3月孙中山与大元帅府人员合影^{〔17〕}时除孙中山、宋庆龄以外其他人员所坐的藤椅完全一样，这也说明是在大元帅府合影。

会场背景为何悬挂三面旗帜：中间五色旗，左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右边十八星旗，即所谓第一国旗、第二国旗、第三国旗^{〔18〕}。笔者认为，他们不但是庆祝元旦这一公共节日，更重要是庆祝因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而导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的国庆。

叶夏声，字兢生，广东番禺人，1882年生。15岁时任香港《广东日报》、《中国日报》通讯记者，16岁赴日本留学，19岁回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日本。1917年任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同年9月任大元帅府秘书、军政府代理内政部次长^{〔19〕}。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他指认坐在孙中山左侧的是他自己的该照片为1918年元旦纪念所摄，当可信。

孙中山第一次南下护法期间以哪种旗帜为军政府国旗呢？有人认为是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军政府国旗。其实不然，而是以五色旗为国旗的，这是可以从本文所附图片背景以五色旗在中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海军旗）在左，十八星旗（陆军旗）在右可以证明。其次也可从1917年8月25日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全城高悬五色旗得到佐证^{〔20〕}。

孙中山宋庆龄在出征军人慰劳会上的合影

1921年5月底,孙中山命令兵分几路讨伐广西军阀陆荣廷。宋庆龄在广州发起妇女界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自任会长,进行义卖、义演、捐献等多种形式的筹款活动,支援前线。

宋庆龄组织团体辅佐孙中山,并以组织者身份出现,始于此。当时新闻媒介称“出征军人慰劳会”组织,“实为我国创举”^{〔21〕}。

日前,笔者收集到一幅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附图4),照片右侧盖有“出征军人慰劳会纪念品 黎民伟摄影报效”印章,这是预先刻好的印章盖在每一张照片上作为会议的纪念品分赠来宾的。照片背景左侧有一块广告牌:“注意 敬启者:现慰劳会开设卖物场,原为筹款购物转赠军人,故同人、家属、粤民一分子自当竭尽绵薄,稍尽义务,用特报效,全场茶点鲜食。自阳历七月廿四号(阴历六月二十日)起至七月卅号(六月廿六日)。”照片背景正上方为该会场横额“报效全场茶点鲜食”。

这隆重而热烈的出征军人慰劳会义卖活动,当时报纸也有许多报导。以证实照片确实无误。

“慰劳会定期二十四日开幕,连日各女士在东园卖物场布置一切。”^{〔22〕}“念四日为军人慰劳会卖物场开幕之日,会场设于东园新世界。下午4时举行开幕礼。”胡汉民、马君武、邹鲁、高剑父、唐允恭等到会祝贺^{〔23〕}。“广州出征军人慰劳会,为孙大总统夫人发起组织,实为我国创举,连日在东园卖物场筹款。昨日孙夫人偕同古湘芹夫人、廖仲恺夫人及朱卓文之女公子慕英、慕非两女士……慰问伤兵。”^{〔24〕}

从以上史料介绍和照片背景工作人员忙碌情况看,孙中山与宋庆龄合影时间为1921年7月24日慰劳会开幕前夕;地点在广州东园出征军人慰劳会会场正门。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出征军人慰劳会开幕前夕的合影,到目前为止发现两幅。一幅是在慰劳分正门合影,另一幅是在室外合影(附图5)。此两图在《纪念宋庆龄同志》27、28图,《纪念孙中山先生》234图和《孙中山先生画册》516图中均误为1923年在广州摄影。

在此两图中,宋庆龄身穿白上衣黑裙,右手持伞,左手握皮包;而孙中山则穿白色中山装,上口袋插一朵胸花,右手持文明棍,帽子或戴或持,在两幅照片中,孙、宋两人服式、穿戴完全相同,无疑是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事件而摄。

出征军人慰劳会会址设于东园新世界。东园旧址在广州今东园横路以南,东园路以东、挹翠路以西、东堤以北的一片空地上。东园门楼至今存在。东园内原有一栋两层楼房,可能就是当年的“新世界”,后被毁。1985年仿造重建。作为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时总工会遗址,俗称红楼。

孙中山1917年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期间,有些活动是在东园举行的。如1917年7月27日,广东海陆军警就是在东园欢迎孙中山的;同年8月6日孙中山在东园欢迎程璧光等南下护法的海军将士。东园还是群众集会的场所,如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议会就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是晚,广州各界举行恭祝大元帅就职礼提灯会,参加者万余人,集中于东园,由东园起行,绕城一周,最后回到东园。

作为群众性组织的出征军人慰劳会,开设卖物场、义演场等筹款活动,市民可随便到园内捐钱捐物,是个理想的场所。

1978年,“四大寇”之一杨鹤龄的养子杨国铨赠给笔者一张照片,照片片额上写着:“广东军政府成立全体军政人员摄影纪念 民国六年九月于广州。”(见附图6)在人物像下方相应位置写有孙中山、伍廷芳、谭延闿、程潜、胡汉民、廖仲恺、杨鹤龄、孙科等人名字。

照片中有杨鹤龄,可从杨与孙中山重逢的时间及其他人物来分析此照的摄影时间、地点及事件。

杨鹤龄参与孙、陈、尤的“四大寇”时间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此后杨服务于《中国日报》至光复前,一直在港澳居住。1919年5月16日杨鹤龄致孙中山求职函中称:“自我公乙未举事(按:1895年10月广州首义)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若用作奔走,作为心膂,赵充国所谓无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²⁵⁾5月24日孙中山批复:“此间现尚无事可办,故闭门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²⁶⁾1920年1月26日,杨鹤龄再度上书孙中山求职:“近观大局,知己大有转机,广东三千万同胞,日日望公解决,非复如前岁之情况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极欲服劳民国。若得追随左右,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始谋于我,而收效岂可无我乎?嗟呼,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想公必不使四皓永匿商山,二老长居东海也。”⁽²⁷⁾从杨鹤龄致孙中山这两函中可知,杨鹤龄未参与孙中山1917年至1918年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工作,此照不可能是1917年9月“广东军政府成立全体军政人员摄影纪念”。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同年5月5日孙中山就大总统职。不久,孙中山下令拨款3000元修缮粤秀山(今越秀山)的文澜阁,延请30年前最早在香港密谋革命的“四大寇”同志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到广州居住。把文澜阁改为“三老楼”⁽²⁸⁾,同时聘任陈、尤、杨三人为总统府顾问⁽²⁹⁾。不久因三人性格不合而分道扬镳,陈少白随孙中山出巡广西,尤列去了香港,杨鹤龄返回澳门。

杨国铨先生还同时赠送笔者一张聘任状照片,内容如下:“聘任状 第壹贰号 敦聘杨鹤龄先生为本府顾问。此状。 孙文。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十四日。”此聘任状《孙中山全集》未收录。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知,杨鹤龄于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才到广州,并与陈少白、尤列一起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孙中山于1921年10月15日出巡广西,以后孙杨再无聚会机会。1923年4月4日孙中山虽然“派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³⁰⁾,但杨鹤龄仍居澳门,未到过广州。至于杨鹤龄任广州光复中学校长时,孙中山已逝世多年了⁽³¹⁾。由此可推断,有孙中山和杨鹤龄在场的这幅照片,无疑是摄于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至同年10月15日孙中山出巡广西前这段时间。

在此不足半年时间里,广州革命政府举行的最隆重的活动莫过于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庆典。据报导,1921年10月10日上午九时在总统府举行庆祝典礼。参加十周年庆典

典的有各部总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参军长、大理院长、广东省长、海军总司令、总统府顾问等文武官吏六七百人。所属官员均礼服到贺。礼毕，在总统府头门摄影。随后赴北较场阅兵^{〔32〕}。照片中有外交总长伍廷芳、参议院议长林森、海军总长汤廷光、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财政次长廖仲恺、顾问杨鹤龄、广州市长孙科等。

据此分析，此照合影于1921年10月10日在广州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似应无误。照片背景为两面倒八字状大五色旗（第一国旗），五色旗后面为两面小旗，左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第二国旗），右边为十八星旗（第三国旗）^{〔33〕}。这说明此时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仍尊五色旗为国旗。

孙中山在阅兵

附图7在《孙中山先生画册》459图的说明是：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同军政人员合影。”在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馆藏照片的文字说明是：“1921年7月，孙中山检阅即将入桂作战的第一师官兵。孙中山同参加检阅者合影。”

首先我们看看照片中人物。前排右起：程潜、古应芬、叶恭绰、胡汉民、谭延闿、林森、孙中山、伍廷芳、杨鹤龄。

据上篇《孙中山在广州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大会与文武官员合影》分析，以及杨鹤龄于1919年5月16日和1920年1月16日致孙中山求职两函中可知，杨鹤龄是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以后，孙中山聘任他为总统府顾问才到广州的，在此以前“数十年”都住在港澳^{〔34〕}，孙中山于1921年9月14日“敦聘杨鹤龄先生为本府顾问”^{〔35〕}，笔者认为杨鹤龄不会早于9月以前到达广州。纵使同年7月份孙中山检阅即将入桂作战的第一师官兵，杨也不可能参加该次的检阅合影，更不可能参加同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时合影。

此照片只能是广州革命政府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在北较场阅兵台上的合影。从人物的服饰看，此照与上篇《孙中山在广州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大会与文武官员合影》附图中的主要人物的服饰完全相同：孙中山穿西装，打蝴蝶结；伍廷芳、谭延闿、胡汉民、杨鹤龄穿白长衫黑马褂；程潜戎装军帽，手持指挥刀；林森着西装，左胸有一装饰物。

至于上文附图与此文附图人数多寡问题，是因为上文附图是在总统府举行庆典后合影，而本文附图是在北较场检阅台上。据当时报导：“大总统亲赴北较场阅兵，伍总长父子等随同参阅。”^{〔36〕}就是说随同孙中山从总统府到北较场阅兵官员不是全部而是伍廷芳等部分僚属，这是两照片人数不一的第一个原因。其次，是检阅者分座次坐的原因。从背景两边写着“总统席”可知，此照片中的人物仅是“总统”孙中山及其上层僚属及保卫人员，至于其他席位上的其他官员则无法包括其中摄影之故。

孙中山于1921年10月15日出巡广西，至次年4月底才返广州，杨鹤龄未随孙中山赴广西^{〔37〕}。杨鹤龄在广州住了几个月后即返回澳门居住。此后孙杨再没有聚会机会。

因此，此照片摄于1921年10月10日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在广州北较场阅兵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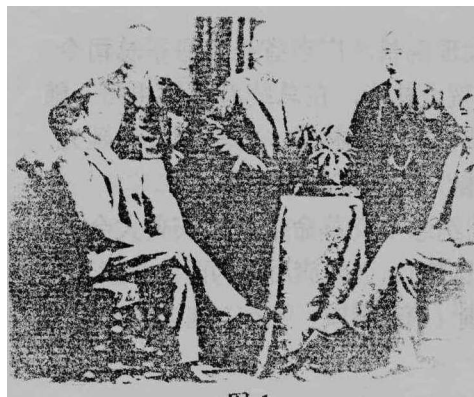


图 1



合 家 照

• 山青翠映水日輝，雙雙夫婦和衣一張於文圖 • 天祥年六九八一元公於誠無強據
• 宅一佳合氣家影便與，廣東鳳遊內圖自亦女下與、人天童、人夫太婦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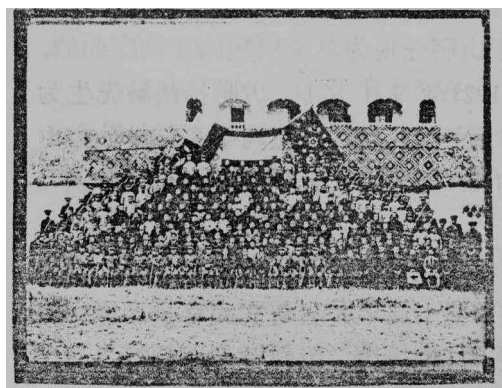


图 3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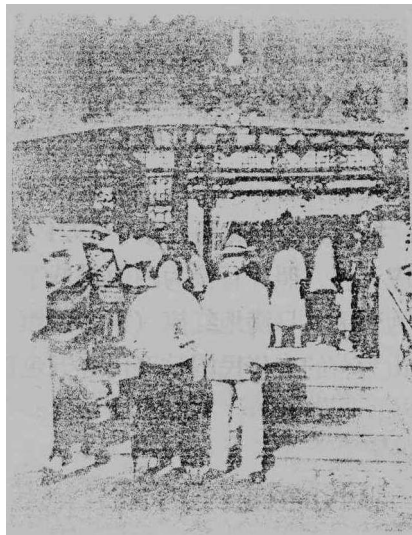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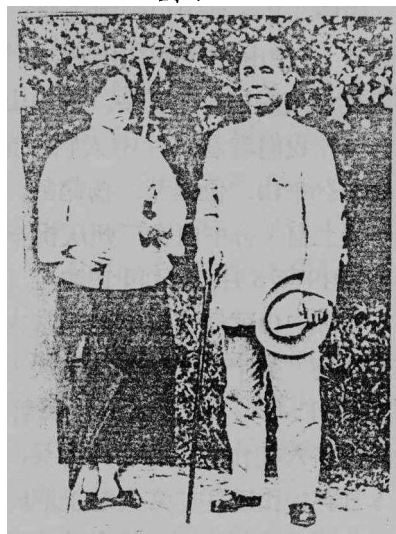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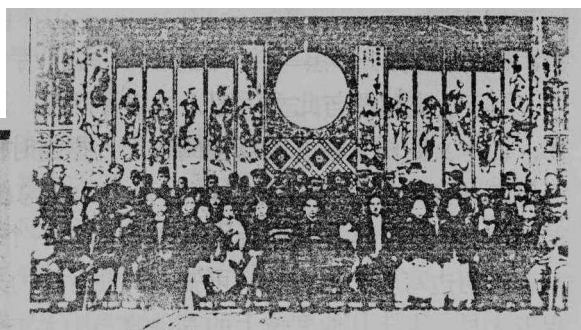


图 7

注:

- (1)〔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6、125页。
-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28~137页。
- (3)〔4〕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263、268页。
- (5)〔6〕 《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70页。
- (7) 李伯新:《孙中山的亲属和后裔》,《中山文史》第27辑,第125、127页。
-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辑,第4、9页。
- (10) 《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台湾,1984年初版,第66页。
- (11) 《良友》,1926年上海版。
- (12) 《新政府庆祝国庆纪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5日。
- (13)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54页。
- (14) 《大元帅就职纪盛》,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16日。
- (15) 《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 (16)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43~600页。
- (17) 《纪念孙中山先生》190图。
- (18)〔33〕 《党旗和国旗》,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委宣传部印,第32页。
- (19) 《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0) 《非常国会开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8月31日。
- (21)〔24〕 《粤女界慰问伤兵之恳切》,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8月5日。
- (22) 《粤慰劳会布置齐备》,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31日。
- (23) 《粤慰劳会卖物场开幕》,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8月1日。
- (25)〔27〕〔34〕 《国父的人格与风范》,《台湾日报》1986年11月12日。
- (26)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57页。
- (28) 《革命文献》第64辑,第68页谓“文澜阁”改名“四寇楼”。
- (29) 陆丹林:《革命史谭》,第279页。
- (30)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93页。
- (31) 《林一厂日记》(手抄本),1944年2月9日项下。
- (32) 《新政府庆祝国庆纪念》,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5日。
- (35) 杨鹤龄之养子杨国铿于1978年底赠笔者《聘任状》照片。
- (36) 《国庆纪念日之广州》,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7日。
- (37)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87页。